

# 理论周刊

2026.8.19 星期三  
责编: 张茜楠 朱希杰 版式: 吕美君 电话: (029)81140213 csjrbl@163.com

A1

## 优化营商环境 强化党建引领

**摘要:**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开放红利加速释放,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民营经济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本文从党建引领与营商环境优化两个维度切入,运用“制度—组织—治理”三维分析框架,揭示二者协同赋能民营企业治理创新的内在逻辑与耦合机理,探讨党建融入民企治理结构、合规经营、人才培养的实践路径,为自贸港背景下民营企业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进路。

**关键词:**海南自由贸易港;营商环境;党建引领;民营企业;治理创新

2025年12月,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正式启动,标志着海南对外开放迈入制度型开放全新阶段。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印发实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以下简称《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落地施行,再到各类配套制度和创新举措陆续落地见效,海南自贸港建设始终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营商环境优化为关键抓手、以高水平开放为鲜明发展底色。当前,“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核心制度框架正在加快落地成型,一座更加开放、更具活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正在南海之滨加速崛起。

民营企业是自贸港建设的生力军,更是营商环境优化的直接受益者。习近平总书记在2025年2月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党和国家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将一以贯之坚持和落实,不能变,也不会变”,勉励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sup>[1]</sup>。从理论逻辑来看,优质营商环境是民营企业发展的外部制度保障,党建引领是民营企业治理升级的内生核心动力,二者共同构成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体两面。立足自贸港建设背景,如何以党建引领民营企业治理创新,以优化营商环境激活民营经济发发展动能,推动外部制度供给与企业内部治理升级深度契合、同频共振,是当前亟待破解的重要理论与实践课题。

### 一、党建领航铸魂,筑牢治理根基

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战略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强调“正确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引导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长正确理解党中央关于‘两个毫不动摇’‘两个健康’的方针政策,消除顾虑,放下包袱,大胆发展”<sup>[2]</sup>。“两个健康”——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是新时代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根本遵循。党建引领民营企业治理创新,核心在于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把方向、聚人心、促规范、保合规。从理论维度看,党建在民企治理中承担着三

重功能:政治引领的“方向盘”功能、组织凝聚的“黏合剂”功能、治理规范的“压舱石”功能。

从政治层面看,党组织是民营企业引航定向的关键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sup>[3]</sup>。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列为重要改革举措到该法正式施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日趋完善,从顶层设计上决定了民营企业必须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同向同行。党建工作的首要政治功能,就是引导民营企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确保企业发展不偏航、不迷路。正是有了党组织这个“定盘星”,民营企业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在利益诱惑面前守住底线红线。

从组织层面看,党组织是凝聚民营企业人心的桥梁纽带。民营企业党建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将各方力量团结在党组织周围,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增强企业向心力和组织认同。尤其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市场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党组织能够发挥稳军心、增信心、暖人心的独特优势,将组织资源转化为人文关怀,将政治优势转化为精神激励。光明日报刊发的理论文章明确指出,“党建工作抓实了就是生产力,抓好了就是凝聚力,抓住了就是竞争力”<sup>[4]</sup>。这一论断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揭示了党建与企业发展的内在关联——党建工作与企业经营并非割裂运行,而是深度融合的有机整体。

从治理层面看,党组织是规范民营企业管理的制度性力量。202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明确要求“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党组织作用”“推动企业加强法治教育,营造诚信廉洁的企业文化氛围”<sup>[5]</sup>。这份被称为“民营经济31条”的文件,将党建工作纳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制度框架,赋予党组织明确的治理功能定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民企要“着力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股东行为,强化内部监督”<sup>[6]</sup>,健全风险防范机制。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看,党建嵌入民企治理实质上是将党的组织与制度资源转化为治理效能,降低内部交易成本,推动民营企业从“家族治理”“经验治理”向“制度治理”“现代治理”转型。

### 二、营商聚力筑基,厚植发展沃土

法治是最优营商保障,是民营企业扎根自贸港的信心基石。从制度供给的角度看,营商环境的核心要义在于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体系亦将监管框架的清晰性与可预期性作为关键维度,因为市场主体的投资经营决策高度依赖对制

度环境的稳定预期。海南自贸港以制度型开放为引领,将这一逻辑贯穿于营商环境建设全过程。《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第四条明确规定:“持续优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和公平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sup>[7]</sup>,以立法形式将营商环境优化上升为国家意志,保障各类经营主体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进一步在公平竞争、投融资、科技创新、权益保护等维度搭建完整制度框架,与《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协同配套,为自贸港民营企业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制度是核心营商亮点,是自贸港开放发展的鲜明标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确立了以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核心的制度设计,涵盖贸易、投资、跨境资金、人员进出、运输来往、数据流动六大自由便利领域及税收、社会治理、法治、风险防控四项制度保障。在投资领域,方案要求严格落实“非禁即入”,实施市场准入承诺即入制、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海南据此推进极简审批改革,缩减审批环节与时间成本。在贸易领域,构建“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货物贸易监管模式,实行以“零关税”为基本特征的自由化便利化制度安排。方案设定目标:到2025年营商环境总体达到国内一流水平,到2035年营商环境更加优化<sup>[8]</sup>。封关运作以来,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进一步优化,享惠门槛降低、受益面扩大,有利于培育产业链和产业集群<sup>[9]</sup>。同时,“分批出岛、集中申报”等通关便利化举措的实施,实现“一次申报、一站放行”,企业通关效率显著提升。

政策是重要营商支撑,是民营经济提质增效的顶层指引。《民营经济31条》系统部署31项政策举措,强调加快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坚持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将民营经济提升至今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这是中央首次以顶格文件形式系统部署民营经济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于2025年5月20日起正式施行,作为我国第一部专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将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确立为国家长期坚持的重大方针政策,标志着民营经济法治保障进入全新阶段。从政策引领到立法保障,从制度供给到环境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根基不断夯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制度红利持续释放。

### 三、双轮驱动赋能,共创治理新局

党建引领与营商环境优化并非彼此割裂的两个维度,而是相互支撑、协同发力的有机整体。从理论逻辑看,二者存在深刻的耦合关系:党建引领为民企治理创新铸魂定向,解决“为谁发展、朝哪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营商环境优化则为民企发展赋能增效,解决“何以发展、怎样发展”的现实性

问题。前者属于内部治理范畴,后者属于外部制度环境,二者共同构成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因—外因”协同架构。这种协同的内在机理在于双向赋能:一方面,外部制度环境的优化为内部治理升级注入了双重力——制度红利提供正向激励,合规门槛形成倒逼压力;另一方面,内部治理能力的提升使企业更善于捕捉制度红利、适应制度变迁。二者相互促进,形成正向反馈的良性循环。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唯有双轮驱动、同向发力,方能凝聚治理合力,开创民营企业治理现代化新格局。实践中,推动党建融入民企治理需在三个层面协同发力:治理结构解决制度嵌入,合规经营解决风险防控,人才培养解决持续发展,共同构成系统路径。

其一,融入治理结构,实现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有机统一。推动党组织班子成员与企业管理层“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将党建工作嵌入法人治理结构的各个环节,使党组织在企业决策、执行、监督全链条中发挥实质性作用。这实质上是将党的组织体系内嵌于现代企业治理架构,实现政治逻辑与市场逻辑的有机融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在治理结构上,民营企业同国有企业一样,也要勇于自我革命,积极优化和调整”<sup>[10]</sup>,将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方能奠定制度根基。

其二,融入合规经营,以党建引领筑牢企业风险防控底线。《民营经济31条》明确指出,要“构建民营企业源头防范和治理腐败的体制机制”“引导民营企业建立严格的审计监督体系和财会制度”<sup>[11]</sup>。文件将党建与合规经营明确挂钩,要求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党组织作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合规经营的核心在于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成本,党组织在企业内部具有天然的信息优势和监督优势,能够有效弥补外部监管盲区。党建工作与合规经营深度融合,能够从价值观层面引导企业诚信守法经营,从组织层面推动内部监督体系健全完善,从制度层面营造风清气正的廉洁文化。

其三,融入人才培养,以理想信念教育锻造新时代企业家队伍。企业的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人。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

勉励民营企业家人“满怀创业和报国激情”“不断提升理想境界,厚植家国情怀”“富而思源、富而思进”,同时指出要“高度重视企业接班人培养,有针对性地加以塑造和锤炼,让企业后继有人、持续健康发展”<sup>[12]</sup>。从人力资本理论审视,企业家精神是稀缺生产要素,理想信念是其内核。党组织在人才培养中发挥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做好新生代企业家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年轻一代传承听党话、跟党走的光荣传统,是确保企业基业长青的战略工程。

同时,应充分运用数字化赋能方式,推动智慧监管与党组织动态管理有机融合、大数据研判与党建精细化管理深度贯通,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持续提升治理精准性与公开透明度。以一流营商环境建设推动民营企业完善内部治理,依托党建引领增强企业合规经营意识与现代化治理能力,依靠制度创新搭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联动的桥梁,构建起“党建引领、制度护航、企业自觉”的发展良性循环,助力广大民营企业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改革开放实践中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

海南自贸港承载着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探路的时代使命,其建设成效不仅关乎一省一域,更关乎国家战略全局。回望来路,从总体方案到自贸港法,从制度创新到全面深化改革,海南始终以法治为基、以开放为魂、以创新为要。展望未来,发展方向已然明朗——以高质量党建强民企之魂,以高水平营商环境优发展之境,以民企治理现代化筑牢高质量发展之基,让广大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最前沿汇聚磅礴力量,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注入不竭动力,在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宏大叙事中书写崭新篇章。

**基金项目:**2025年海南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项课题“海南自贸港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与增强民营企业内生发展动力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5HNMGC09);2025年度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党的领导融入自贸港企业现代公司治理创新模式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HNSK(ZC)25-299)。

**作者:**杨欣,王彦玲(三亚学院社会治理学院)

###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J].求是,2025(16):14-25.
- [2]付佳迪.提高党建质量,引领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N/OL].光明日报,2023-11-01[2026-08-04]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296223926332801588/?&source=m\_redirect.
-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

济发展壮大的意见[Z].2023-07-19.

[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Z].2021-06-10.

[5]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Z].2020-06-01.

[6]海南省人民政府.《此次出台的加工增值货物内销免关税政策与现行试点政策相比作了哪些调整优化》[Z].2025-08-06.

## 金融企业数字化战略实践中的科技人力资源使用模式探析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科技人力资源已成为金融企业的核心战略资源。随着业务系统数量增长和技术栈日益多元,传统以供应商团队为单位、与特定系统绑定的人力外包模式,在资源灵活性、成本可控性和自主掌控力等方面逐渐暴露出局限性。如何构建更加集约、灵活、高效的科技人力资源使用模式,成为金融企业数字化战略落地中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

### 一、传统模式的现实困境

长期以来,金融科技开发普遍采用供应商团队外包模式,随着转型深入,内在矛盾日益凸显。

一是资源配置僵化,跨系统复用困难。外包人员与特定供应商、特定系统深度绑定,即便人力能力出众且对其他项目有需求,也受组织形式限制无法灵活调配。当不同系统开发高峰期存在时间差时,人力错配问题尤为突出。

二是能力识别粗放,人岗匹配精准度不足。传统模式往往只按初、中、高级粗略分级,缺乏对技术栈的细分识别和个体能力的精准画像,企业只能被动接受供应商团队的整体配置。

三是自主可控能力提升受限。系统架构

设计、技术选型和开发节奏往往由供应商团队主导,企业科技人员更多承担协调和验收角色,关键环节的话语权和掌控力难以实质提升。

### 二、资源池化的模式创新

针对上述问题,一种基于技术栈的科技人力资源池化管理模式正在业内探索成形。其核心逻辑是打破供应商与系统的绑定,以技术能力为导向建立集中化的人力资源储备池,实现科技人力资源在全企业范围的统一调度和灵活配置。

组织形态从供应商团队转向个体能力单元。企业不再以供应商团队为基本使用单元,而是以具备特定技术栈能力的个体人员为管理对象。通过集中采购确定入围供应商后,企业对推荐人员进行统一面试筛选,合格者纳入资源池,按技术标签统一建档。项目立项后,需求方从资源池中选取匹配人员组成团队,项目结束后人员归还资源池。企业从被动接受团队转向主动组合团队,真正掌握了人力资源配置的主导权。

能力管理从“粗略分级”转向“技术栈精细分类”。资源池化的前提是对科技人力的能

力维度进行精细化拆解,将开发、测试、数据、AI应用、持续交付、需求分析等方向分别建立能力标准,再细化到具体的开发语言、框架、工具和业务领域知识。这种分类方式使人员能力与项目需求的匹配更加精准,也为人员定级、薪酬定价和能力评估奠定了基础。

运行效果实现自主可控与灵活高效的双重提升。由于项目团队由金融企业主导组建,架构设计、技术选型、任务分解等关键环节由金融企业科技人员牵头负责,外包人员承担具体编码工作。这种使用方主导、外包补充的分工模式,不仅推动自研率稳步提升,也显著缩短了项目人力准备周期。

### 三、运行机制与制度保障

资源池化不是简单的人员集中管理,而是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需要在入口、使用、质量、评价四个环节建立配套机制。

入口环节,建立统一入口与分级筛选的入池机制。企业通过集中采购确定入围供应商范围,再对推荐人员进行统一面试和能力评定,按技术栈和等级纳入资源池。面试应引入各业务板块的科技研发专家参与,从技术能力、业务理解、沟通协作等维度综合评判。

们不得不寻求市场化替代方案来填补情感需求的日常缺口。

其二,工作节奏对个人时间的挤压。高强度劳动消耗大量精力,用于维护和发展深度人际关系的时间预算被严重压缩。情绪消费提供的“即取即用”体验,恰好适配了碎片化时间下的情感补给需求。

其三,消费社会的文化转向。在物质消费边际效用递减的背景下,消费重心从“拥有什么”转向“体验什么”,消费者愿意为产品和服务所承载的情感附加值支付溢价。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判断。首先,业态分化是必然趋势。情绪消费涵盖从数元的解压小物到千元的陪伴服务。不同产品对应不同情绪需求的强度与频次,市场将自然形成层次分明的品类矩阵,不能试图用单一逻辑统摄整个市场。其次,定价权最终取决于情绪调节效率。消费者为情绪付费,支付意愿取决于“能否有效改善当下感受”。产品能否精准识别用户情绪状态、能否快速提供有效反馈,决定了复购率与溢价空间。最后,标准化与伦理框架亟待建立。情绪消费直接作用于人的心理状态,

其质量关乎消费者福祉。当前市场缺乏统一的服务标准、质量评估体系与消费者保护机制,这是行业健康发展必须正视的痛点缺口。

情绪消费是市场主体在察觉到社会情感结构变化后,借助技术进步作出的供给侧回应。作为一种新兴的消费形态,需要理解它的社会情境与市场逻辑,不能简单用非黑即白的标签对其进行否定或神化,而应该以更包容理性的态度引导行业走向规范化。

**作者:**侯馨媛[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行政学院)]

## 情绪消费的社会情境与市场逻辑

“情绪消费”正成为消费市场的高频词汇。从Jellycat玩偶的溢价抢购到直播间情绪化下单,从解压玩具热销到情感陪伴服务订阅,一个以情绪价值为核心驱动力的消费生态正在形成。然而,对这一现象的认知常落入两极:要么将其浪漫化为“悦己经济”的自我实现,要么将其批判为消费主义制造的虚假需求。

情绪消费并非新鲜事物,人们为演唱会门票付费、为心理咨询买单、为一次旅行体验支付,都是在购买情绪体验。当下,需求从体验的“附属品”上升为购买的“核心标的”,供给从偶

发、非标走向规模化、可及化。

从经济学视角看,情绪消费属于典型的服务消费,购买的是特定时间段内的某种心理状态——慰藉、愉悦、陪伴或认同。它与日常消费服务的差异在于消费对象为情感层面的即时调节,是服务消费在心理需求维度的自然延伸。情绪消费的崛起,根植于社会结构的深层变迁。

其一,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人口高流动性与城市原子化生存,使得传统以家庭、邻里为核心的即时情感支持系统趋于弱化。因此,人